

大军西进记(中)

罗立斌

马鸿逵保三师主力凭借清水沟(在吴忠堡南,深宽各丈余),在渠北一线布防,并在吴忠堡以南各村纵深分散固守堡垒。我先头部队于二十日黄昏进抵滨河桥附近,拂晓前该部三连奉命架桥,在敌一座高碉四个地堡的火力射击下,该连战士,有四次负伤仍然坚持作战的,终于将桥架成,并占领敌人的桥头堡垒,使主力得以安然渡河。其后,我部分路猛插吴忠堡外围守敌,不顾少数敌侧击,直捣敌人心腹,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正面攻击与侧后迂回,勇敢与技术,顽强与机智密切结合,经过数小时激战,终将敌人防线全部摧毁,纵深整个打乱。我某部七连由于步炮协同,战场互助,火力爆破与突击结合得好,连克四个堡子,歼敌一个团部另一个营,生俘一百七十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十四挺,步枪四百五十支,自己却无一伤亡。该部一连六班勇敢机智地俘敌一个排,七班长又二次完成爆破任务,全歼固守马建营顽抗之敌一个排。中午,我左翼部队势如破竹,首先进占吴忠堡,该部八连插入敌纵深后,七连迅速地插至吴忠堡东北角堵截逃敌,生俘敌七十余人,我无一伤亡。此时右路友军,亦在吴忠堡以东地区,歼俘甚众。敌保三师主力会同从灵武增援之五二六师一部,除少数由敌一二八军军长率领早已渡黄河西窜,少数在我部进占吴忠堡时狼狽北逃外,大部被歼,被我部生俘者即达千人。

接着我部留一部分兵力于吴忠堡搜剿残敌,监视金积,维护秩序,保管资财,主力毫不停息地向灵武猛追。进至距灵武城十余里处,敌二五六师副师长,政工处长及伪灵武县长,商会代表等前来求降,

我们在毛主席正确的八个条件原则下,允许他们将城外部队撤至城内集结,听候改编。我部随即以一部进至城东、城南,一部进至城西,另一部从城西绕到城北,分别包围监视敌人。当我部进至灵武城郊时,敌二五六师主力及保三师北军之残部,已有一部北逃渡河,城内残敌只有一个团另两个营,及一二八军军部、二五六师师部等残部,亦开始溃散或藏匿,师长、副师长等在逃。我部绕至城北部队当即堵截一部,其后又派出小部直插灵武西北二十余里之仁存渡,又截得汽车八辆及一部逃敌物资,共俘敌八百余人。该部从二十日拂晓至二十一日午夜,除在吴忠堡以南地区休息两三个小时外,一直在行军战斗中,很多单位只吃了一顿饭,不少通讯人员根本没有吃上饭。我部包围城西部队,因遍地汪洋,只有芦苇枯草,没有人家,为了确实完成任务,忍着饥饿,在水里泡了半夜,天明后战士们个个满身湿透,满脸泥泞,互相看着开玩笑。午夜后,我部于拂晓前先进入城内,收缴武器,收容残敌,清理仓库,维护秩序。”其后,我们又派小部队到城东、城北各地,收容散兵游勇,搜捕大小股匪,亦获得不少成绩。

三、老百姓

“打到宁夏去,消灭马家军!”“消灭两马残余军队,全部解放大西北!”“庆祝解放军胜利出征,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固原城东门外,大道旁,拥挤着欢送的人群,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热烈地鼓掌,喊着口号,敲着锣鼓,放着鞭炮。小学生们捧着一束束的鲜花,争着插向战士们胸前。长蛇般似乎无穷无尽的行列,

在细雨蒙蒙中,不断向北蜿蜒伸展。“奋勇前进,消灭乌马军队!”“打好仗,搞好政策纪律,不负固原人民的欢送!”等口号,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坎里。

进军途中,我们一路看到宁马部队抢掠洗劫的痕迹,也一路听到回汉人民对马部暴行的控诉。马部每到一地,不仅抓兵抓夫,而且抢光烧光。小市镇的商人,农村里的老乡,只要有点东西的都被拿走了。门窗、麦穗都是他们的燃料,田里的粮食庄稼都放了牲口。毛驴、骆驼见一个拉走一个。因此,广大群众把我们看成救命星,盼解放军像盼自己久别的亲人。我军在金积以南追击溃敌,进入马家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迎头兴奋地喊:“救命的恩人来了,可把我们的眼睛盼红啦!”吴忠堡一个六十多岁的白发老妈伸出颤抖的手,拉着战士们说:“哎呀!可见太阳了,我三个儿子,给马家抓走了两个,剩下一个小的在家,没吃没喝。听说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又讲宽大政策,不会像马匪那样抓人当兵的,这真是救命恩人啊!”另一个老汉颤抖地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头一回抓兵花了四百块白洋,第二回要了又花了三百块,第三回实在花不起了,眼看着马家把他拉走了……接着,他指着黄河西岸大骂:“马鸿逵,马鸿逵你可坏到头了,害死多少老百姓啊!”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喊出:“我们要彻底消灭马家军,解放大西北,给老乡们报仇!”在灵武一带,群众纷纷向我们讲述马鸿逵“丁、粮、皮”的暴政,每天不是缴粮就是抓兵,一切屠宰的羊皮都被没收去,苛捐杂税,可以列举出名目的就有三十八种。

黄河与宁夏水利·宁夏引黄灌溉事业

宁夏引黄灌溉水利述要(二)

吴尚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开的自流渠道,依建成年代顺序,计有第一农场渠(秦渠的支干渠,1951年开),第二农场渠(唐徕渠的支干渠,群众称“二唐渠”,1954年开),中宁跃进渠(扩大延长新生渠而形成的一条主干渠,1959年开),西干渠(与“吴王渠”或“靖虏渠”约略平行,是河西灌区最高的一条主干渠,1960年开),中卫北干渠(系美利渠支干渠,1964年开),东干渠(青铜峡坝上引水,是河东灌区最高的一条主干渠,1975年开),中宁高支渠(系七星渠支渠,1977年开)。

从渠道的发展历史看,修建大干渠的次序都是后来者居上,即由引水较易的低部位渠道,向引水难度较大的高部位发展。试看河东,汉渠在秦渠之上,由青铜峡坝上引水的东干渠,更在汉渠之上。河西灌区的唐徕渠在汉渠渠之上,西干渠更在唐徕渠之上。这与治水知识经验的累积,工具材料的改进,人力、财力的增长,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兴衰分不开。水利事业的进退,历来是朝代兴衰的有力佐证。

在1952年,汉延渠唐铎在一次决口事故中,被冲出了一个直立的横剖面。通过这个横剖面可以明显地看到,当年的汉延渠是一条底宽1米左右的小渠,而现在的汉延渠低宽4米左右,是一条过水近70立方米/秒的渠道,它是伴随着灌水淤高而逐步扩大的。由此可以看出,古代遗存的渠道,都经历了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由短到长的演进过程。预计今后,随着沙坡头、大柳树等黄河梯级水利工程的建设,更高

更大的新渠道,将显现于未来。

综上所述,增开渠道,历有兴办,盛进衰退,总在前进。

三、灌区及面积

本灌区依自然地形,由以下两个片区组成。

1.中卫、中宁灌区(简称卫宁灌区)是傍黄河两岸的狭长灌区
黄河出黑山峡,由中卫下河沿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长123公里,河水流向,在中卫县境内是东西走向,到中卫的鸣沙后转向北,河道比降为1/1040,接近青铜峡水库区的白马以下为1/8500。这段河道坡陡流急,因而灌溉引水与排水均较畅利。历来就是农业的高产稳产区。

卫宁灌区的总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其中自流渠道与河边包罗的面积为658平方公里,黄河河道占有236平方公里,现有实灌面积为72.3万亩,系渠道配水面积,上报数为57.4万亩。灌区边缘的提水灌溉面积,包括同心及南山台子扬水,已近16万亩,正在发展中。

2.青铜峡灌区

黄河出青铜峡后,两岸地势开阔,形成河东(右岸)、河西(左岸)两灌区,至石嘴山(自流灌区的末端),河道长194公里。河道比降,叶升大桥以上为1/1430,永宁东升至石嘴山为1/6100-1/9900。地面坡度,由南向北,逐渐变缓,故渠道引水,多在青铜峡出口处。银川以南的排水,大都能直入黄河,而银川以北,受地槽平缓的限制和黄河大水的顶托,出流不利,致使地下

水充斥成灾,土壤盐渍化相应地加重。

本区内,自流渠道与河流边线包罗的面积,河东为935平方公里(内有陶乐县的147平方公里),现有渠道配水的面积约86.5万亩(上报数为64.2万亩)。河西为4197平方公里,现有渠道配水面积为254万亩(上报数约为202万亩)。灌区边缘的提水灌溉近30万亩。黄河河道占有276平方公里。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灌区的实灌面积,有了空前的发展。据记载,截至1949年的最高灌溉面积曾达196万亩,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灌区的征收水费面积已有154万亩。到1981年,全灌区的渠道配水面积,包括灌区边缘提水灌溉的44.46万亩在内,共达412.7万亩,比上报数的323.17万亩,多出89.2万亩,但仍小于实际的灌水面积。根据平罗、贺兰等县的土壤普查资料证实,实灌面积为上报面积的1.4倍。据此推断,全灌区的实灌面积,当在450万亩以上。灌区内插花分布的盐碱荒地的改造利用和灌区边缘的提水灌溉正在逐年扩大,灌溉面积的年增长率在5-7%左右。

全灌区现有自流渠道包罗的面积(不包括黄河河道)为6667平方公里,加上提水灌区,共在8000平方公里左右。近期的自流灌溉面积达到600万亩,提水灌溉面积达到100万亩,共700万亩的实灌面积是可以现实的。随着黄河梯级开发的实现,即高出灌区的渠道将会出现,灌溉面积还会增大。如黄河黑山峡、大柳树高坝一级开发方案的实现,将使本灌区的自流灌溉面积增大1倍以上。(未完待续)

历史回眸

记一次引人注目的会议(上)

王一兵

1983年1月26日至29日,自治区政协召开了一次引人注目的“知识分子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全区性的知识分子群英会,也是一次为知识分子办实事的大会。会议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开得十分成功。自治区政府主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黑伯理在为大会作的报告中首先指出:“区政协在动员知识分子献身‘四化’大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新的一年里开始的时候,政协召开这次会议,又办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大好事。”

打倒“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很快地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拨乱反正,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知识化了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是建设“四化”的依靠力量。1978年至1982年的5年间,全区为3000多名知识分子平反,为1300多名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知识分子调整了工作岗位,为170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评定了技术职称,还为一大批知识分子解决了住房、子女就业和家属农转非等实际困难。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没有完全肃清,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仍有不小差距,不少问题,不少阻力。诸如“四化是干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现在是九路军比八路军吃的香”“没文化照样种田”一类的言论还有大市场。也就是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尚需大造舆论,尚需仗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义,执正确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之言。“知识分子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出席这次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共114人,其中区政协委员27人,各条战线的代表35人,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包括政协委员中的民主党派成员)24人,各市县代表28

人。代表是由下而上经过反复协商筛选后由秘书长会议讨论定下来的,既照顾到了代表的方方面面,又注意到了代表的先进性。代表中,有老一辈专家学者,有中青年技术业务骨干,有长年战斗在工农业生产和科教文卫第一线的尖兵,也有长期默默无闻地在各级领导机关和科研机关辛勤劳动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事迹都很突出,十分感人。比如宁夏钢厂工程师、区政协委员郑士图同志和他的伙伴们,在一无现成资料,二无成套设备的情况下,经过近10年的刻苦钻研,终于研制成功生产密封钢丝绳的新工艺,从而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使国家建设所需密封钢丝绳基本做到立足自给,每年为国家节约外汇300多万美元,创利税400万元。农垦系统知名的高级畜牧师王柏岭、严纪彤夫妇,多年坚持在灵武农场从事养猪科研工作。他们的父母侨居巴西,有丰厚的产业,故其亲属曾一再挽留他们留在国外,却不为所动。他们培育的灵武型黑猪和瘦肉型猪,为我区养猪业的发展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自学成才的浙江知识青年裘志新、徐培培,经过10多年艰苦培育成功的“宁春四号”春小麦良种,1982年在30万亩大田推广种植,每亩较当地老品种增产150斤左右,当年即增产400多万斤粮食,增收600多万元。总之,他们为宁夏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大书特书之。

会议于1月26日上午在宁夏宾馆隆重开幕,自治区党政领导黑伯理、马信、申效增、马青年、陈静波、黄执中以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雷启霖、马佩勋、洪清国、李凯国、杨正喜、杨遇春、李凤藻等出席了会议。雷启霖副主席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黑伯理作了题为《大力开发我区的智力资源,为开创我区社会主义新局面而奋斗》的报告。

知青在宁夏·青春岁月篇

艰辛的耕耘 难忘的收获

——当年开荒造田增产保收纪实

孙学智

1971年,银川平原西大滩的春天。紧张繁忙的春耕刚刚结束,农五师三十四团十三连(前讲农场十三队)随即召开了“开荒造田,多作贡献”誓师动员大会。崔连长代表党支部发出了铿锵有力的誓言:全体干部战士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响应师、团党委的号召,开荒造田一百亩,做到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力争增长粮食6万斤,为实现全师粮食自给,作出新的贡献!自此,拉开了我们负重拼搏、开拓奋斗的序幕。

第一幕:平田整地。
塞上的初春乍暖还寒,北风呼啸。放眼望去,四号地十一条荒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碱蒿和连片带刺的沙棘丛。它们在寒风中摇摆着,狂风卷起一股股白灰色的盐碱土烟雾,给人以萧瑟荒凉之感。地面高低不平,平均相差1米左右,个别的相差近2米。西大滩号称银川平原的“锅底坑”,地势低洼,盐碱渍生。这里的盐碱地很有特点,经验丰富的老军工为它编了个顺口溜:“湿了黏缠,干了硬,不湿不干不动。”面对如此杂草丛生、凹凸不平且土质黏硬的巨古荒原,军垦战士们斗志高昂,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在放火烧荒集中消除碱蒿、沙棘和芨芨草后,近200名新老军垦战士和6台拖拉机、推土机共同打响了平田整地的战斗。战士们用铁锹和镐头挖起黏硬的土块,用肩抬大筐或身背背斗将高处的泥土运往洼地。新复员的南京部队军人和天津、银川知识青年等新军垦战士们衣服湿透了,肩膀磨肿了,农一师的老军工主动替换;男同志累得筋疲力尽,女同志主动顶上来。为了赶时间争速度,白天,人和拖拉机机械交叉作业;夜晚,拖拉机耕地,耙地,停人不停机。那时工地上车灯明亮,马达轰鸣,声震荒原,好一片战天斗地的壮观景象。历经一个月的奋战,高低不平的荒原变成了平整的条田。

第二幕:播种灌溉。
那时种水稻采用先旱植播种再放水浇地的方式。已开垦的熟地可以说相对轻松有序,但对新开垦的盐碱地则比预想的要难得多。新开荒地田埂松散,不牢固,用水一冲立马泥汤横流,不仅盖埋了种子,还会冲破田埂,使浇灌的渠水顺排水沟而下,将辛勤平整的土地和已播的种种损毁殆尽。在此关键时刻,党支部动员所有青壮劳动力不分昼夜地坚守在水田里。当时开荒100亩地,共有近1400亩的田埂需分工把守。随时巡查哪里渗漏,哪里坍塌立即封堵。由于时刻不能离人,所以战士们吃饭、休息都在田里,水田既是工作地又是宿舍地。那时军垦战士因经济条件所限,绝大多数人没有长胶雨靴,只能赤脚奋战在盐碱泥水中,不仅寒冷刺骨,而且时间长了,小腿和脚腕都会裂口流血,刺疼难忍。有些人用破旧衣服剪成布片捆绑在腿上,坚守岗位;有些人因此感染发烧,经卫生员打针后继续战斗。就这样大约奋战了10天,才使田埂坚固,稻田稳定下来。

第三幕:薅草保苗。
在战士们的汗水和盼望中,水平如镜的稻田上终于长出了鹅黄色的秧苗,继而日渐变成绿色,格外惹人喜欢,寄托着战士们的心愿。但

大家明白,这仅是可喜的第一步,只有精心管理才能使其茁壮成长获得收成。新开荒地,管理难度大。首先,要换水压碱,新开地比熟地至少要多灌3次水。多灌一次水,田埂就多一次危险。其次,要薅草保苗,原本杂草丛生的荒地,灌水后芦草、三棱草和稻草争先恐后地疯长出水面,盖过秧苗。新开地至少要多薅三遍草。技术员告诉我说,这样不仅除草保苗,而且用脚踏路地能增加土壤中的氧气,促进水稻根系发育,根深才能叶茂,才能壮秧。然而多薅几遍谈何容易,甚至是愈来愈难。杂草中属芦草最为顽固难缠,它的根系很深,一拔就断。那时没有劳保手套,一天干下来,许多人手上都磨起血泡或被芦草划破,浸在碱水中更加疼痛。但军垦战士们心齐多打粮食的坚定信念,没有怨言,没有退缩,用破布缠在手上继续投入战斗。最后终于坚持薅了6遍草,比一般的熟地整整多了一倍,其艰难过程难以想象。

第四幕:颗粒归仓。
金秋十月,秋风送爽。新开地里金色的稻浪翻滚,沉甸甸的稻穗随风点头,仿佛在告诉军垦战士们已丰收在望。历经半年多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收获的时刻,大家喜悦的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这是没有经历过此事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然而,好事多磨。当割完、捆完水稻,正待拉运到麦场的时候,老天爷似乎有意难为我们,竟又下起了连绵的秋雨。拉运的拖拉机在泥泞的稻田里无法前进,马车更是无济于事……眼看辛辛苦苦获得的果实要烂在泥水田里,大家心急如焚。不能再等,不容再等,党支部果断决定:全力以赴,背稻入场,确保颗粒归仓,增产保收。党支部的决定,代表了全体干部战士的心愿和决心,无论再苦再累,也要把稻子背到麦场上来。随即展开了背稻抢粮的战斗。战士们脚踏泥水,身背着小山似的稻草,吃力地左右摇晃着放到田埂上,然后再用拖车拉走。背稻抢粮中出现了的一幕幕感人的场景:同志们奋力争先,你背5捆,我背6捆;大家互相搀扶,共同拼搏,整整背了7天,才一捆不落地运到麦场上。脱粒之后,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共收获稻谷65000斤。真正实现了“当年开荒,当年种田,当年增产6万斤”的钢铁誓言。

在总结和讨论这次开荒造田的难忘经历时,全体干部战士有许多切身的体会和感想:如,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拼搏的精神则一事无成;如,人心齐,泰山移,大家团结一条心,就能无往而不胜;再如,干部带头,群众跟上,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等等。作为一名亲历者,对此我深有同感。但是,我最深刻地感受是:只要艰辛的耕耘,就有可喜的收获。这个强烈的感受所包含的奋斗、坚强、忍耐、团结、宽容等精神,使我刻骨铭心,永志不忘,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无时无刻地在告诫着我做人要勇于进取,真诚奉献;做事要扎实认真,吃苦耐劳。正是在这笔宝贵财富的鼓舞和激励下,使我从一名普通的知识青年军垦战士,走向人民教师岗位,走向国家机关公务员中层领导干部的行列,再走到今天,直到永远……

宁夏老字号

西北第一个外国羊毛买办(四)

——忆祖父张嘉荣

张文明 口述 刘继云 整理

民国7年(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石嘴山码头的瑞吉和兴隆两家德国洋行外庄亦告破产关门。

民国10年(1921年),英国的仁记、平和两家石嘴山码头外庄破产。

民国12年(1923年)英国的新泰兴洋行外庄最后破产关门,从此彻底结束了外国洋行垄断西北羊毛市场的局面。

由天津来的买办虽把收购和生产羊毛的业务承包给诸如祖父之类的当地买办兼包工头,但仍然掌握着各自外庄的财权和搜身权。

搜身权是天津英国人办厂的“经验”。每至日落散工之时,这些养足一天精神的天津买办们便虎视眈眈地把守着各自外庄毛场的大栅门,对疲惫不堪的羊毛工人逐个搜身。凡被查出偷毛者,他们便把此人绑在大屎缸前的木桩上,再用粗绳把他的头拉至臊臭的尿液面上,熏上一个把小时后才放人,永不复雇。

天津买办除上述工作外,就是整天,乃至整夜地吃、喝、玩、赌。但他们不抽大烟,不嫖,也极少和当地上层人士来往。

仁记外庄有天津买办各4人,平时和其他外庄的天津买办及祖父各数当地买办

吃喝来往,但从不和工人或小毛头点话。4人合住一院,各有一套水泥砖木结构的住房,一个合用的细石水泥浴池。院内摆满了随季节而调换的各种盆花。中间一个水泥砌成的圆形矮花墙内种着一架葡萄树和几棵苹果树。他们日常生活和安全,由一天津厨师和祖父镖局的十几个伙计日夜伺候着。

每到夏秋二季的毛场开工之时,工人们看见从远处黄河面上飘来皮筏靠岸时,便急忙拥上去,大声吆喝着把皮筏推上沙滩,然后在烈日下开始了一天紧张工作。第一道工序是绞毛绞:从组装成皮筏的二三十个牦牛皮囊里,用力捣出拧成团的羊毛,将其散开摊晒在沙滩上;第二道工序是抖毛:把吹晒干的羊毛中的沙土用力抖掉;第三道工序是晒毛:用大轮牛车把沙滩上的羊毛拉回自己外庄的毛场里,继续在坚硬的黄土地上摊晒、抖毛;第四道工序是打包。光绪末年时,羊毛打包是手工劳动,民国4年(1915年)时,仁记和新泰兴两洋行外庄分别由天津运来了木制打包机,比手工打包快了几倍,且捆扎结实,包重150斤。最后,工人在每包拴上编号的布条,

即可入库待装船外运。

羊毛工人多招雇于石嘴山、平罗、黄渠桥、惠农一带的男性成年回汉农民,日薪百钱,仅相当于二斤羊毛钱。他们日出而作,没有午休和午饭时间,饿了就啃硬馍,就着自家腌制的野沙葱,渴了就喝黄河水。他们抖一天羊毛如同土人一般,精疲力竭,日落被搜身出场,毫无人身自由。

四、买办兼“五品”官的祖父

祖父乃一介武夫,不识字。所以,他初为仁记洋行外庄买办时,只是往来于石嘴山和西宁之间的水运保镖,不参与经营。我的祖母张氏,原是青海省西宁府近郊的湟源县丹格镇人,后在西宁与祖父相识成婚的。

光绪二十七年,祖父不跑外而成为买办兼包工大柜的封建把头后,因人手紧张,便让他的四外甥郑万康负责跑外,让原在磴口县万姓杂货铺当差的大外甥郑万福记账。不久,祖父又介绍郑万福到新泰兴洋行外庄当职员,后来升任新泰兴洋行外庄买办兼包工二柜的封建把头(因我家称大柜),其财力和势力逐渐超过了祖父。(未完待续)